

王秀山 / 著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金融资源效率 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序 言

王秀山博士在他的专著《金融资源效率研究》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要我写些文字纪之。回顾多年以来与秀山君的交往,以及对共同感兴趣而又十分关注的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及经济金融学术问题的研究探讨历程,我们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的往事历历在目,感慨系之,欣然应允,因有此文,是为序。

(一)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对于人类现在与未来意义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内的计算技术、新材料与生物工程;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内,同样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则是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金融工程化。上述两方面的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各民族的国家与经济主体,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大体而言,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变迁表明,由19世纪发端,20世纪不断推进提升的现代化,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工业化轴心而运转的;因此,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以对社会资源,特别是知识与信息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知识化、信息化与金融化为轴心而运转的。当然,观察理解这一势态的理想之地是发达国家,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则正处在各自不同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与过渡性状态之中,不可简单类比。然而无论如何不同,这一态势对一切国家与民族来讲,都将是共同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不管是处在以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工业化轴心的发展阶段,还是处在以社会资源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知识信息化轴心的发展阶段,亦或是二者并存并进的阶段,或者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阶段,就发展进程而言,二者是相互紧密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深化。人们切不可以为

可以不要前者而凭空孤立发展后者,香港是一个城市、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是特例,不足以效仿,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惟一能将此两种发展状态或阶段紧密联系、配置协调起来的要素便是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上述两种“轴心”的核心。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准备与行动,将是十分重要的。

1. 金融对世界与中国都具有极端的战略重要性

最近六七年以来,笔者在许多讲演、学术报告和著作文章中曾强烈呼吁各界要对金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极端关注,包括:(1)当代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其核心的经济,是日益金融化的经济,是金融经济^①。(2)金融具有极端的战略重要性,它已成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②。(3)当代金融问题,首先是全球性问题,然后才是区域性、国别性问题;首先是战略性、宏观性问题,然后才是战术性、微观性问题;首先是理论性问题,然后才是决策性、政策性、行业性、业务性、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实践性问题。(4)金融问题将是21世纪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必须慎重处理的首要战略问题,也将是各国间竞争、争夺与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③,经济外交,特别是金融外交将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影响。(5)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和各国间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对伴随经济金融活动、人员流动、资本外逃、汇率变动等途径产生的严重的“财富转移效应”,应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采取相应对策。(6)反对“金融霸权”、防止“金融侵略”、维护“金融安全”,将获得与传统上以反政治军事霸权、防止军事侵略、维护以领土与军事安全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同等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意义^④,这是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联动互动性、高度流动性和全球性、战略性、宏观性使然。(7)

① 白钦先:《以市场经济原则重建构筑中国的银行体制》,载《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3年2期。

② 白钦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挑战 and 对策》,载《世界经济》,1998年6期。

③ 白钦先:《面向21世纪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处理金融问题》,载《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12期。

④ 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在 21 世纪的基本战略目标应是在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建设金融强国。在当代,不是金融强国的经济强国是不存在的,或者换言之,不建设金融强国就难以实现经济强国,建设金融强国会大大加速与强化经济强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欧元的启动与流通,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就在于此。(8)中国应在国家一级集中人力物力,强化对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资本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和逐步使之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等问题的研究与准备,并应对国家间的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经济金融组织采取比以前更为积极、主动和更富建设性的态度与政策^①。

2. 百年金融的一系列历史性变迁

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特别是最后二三十年,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巨变,这些变革的深刻性与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内,以历史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观察与审视金融问题: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②。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融合及社会财富或资产日益金融资产化,并由此带来了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本身成为庞大金融体系的一个分子和微观影响因素,金融体系的任何波动与危机也越来越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这是百年来金融一系列巨大变迁中的基础性变迁。一般而言,经济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础,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刻表现,但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只有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全球化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对于经济金融化的关注尚未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满足于停留在对经济金融化的具体表现的描述性现象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表现,金融更有其

① 白钦先:“2001 年中国金融学术年会讲演”,北京。

② 现在人们常常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混用或并用,混用是将金融视为经济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包括金融全球化,过去这样用,有其历史合理性;为什么又并用?因为时代不同了,经济并不能完全包括或包含金融,金融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征,所以并用更为科学合理。

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进程。金融全球化不仅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完整、彻底和丰富,而且通过提高市场效率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并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和福利增长,但即使如此,这一点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和必然的,它更可能是非均衡的、非普遍的,或者甚至是理论上的而非现实的。金融全球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其反面的和不利的效应和影响,成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①。

——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且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我在1998年的讲话与文章中曾说“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已不再是现实的金融。”这既是经济日益金融化的结果,也是经济更加金融化的原因,这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传统金融对经济的单纯从属地位和简单的中介功能,也使金融进一步超越单纯的货币银行业务行业部门的微观性特征,提升了金融的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全球性地位。金融成为主导性功能激励因素,彻底改变了传统上金融对经济的从属性、工具性与被动性地位。

——金融商品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复杂化。随着科学技术、金融的电子化、工程化和自由化的发展与深化,金融创新异军突起,影响深远。各种不同期限、不同流动性、不同成本、不同价格、不同风险、不同收益和不同效率的金融商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达几千种之多,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资金运行成本、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资本的流动速度、改变了传统货币供应量的概念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使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协调难度更大、紧迫性更强。在分散或降低微观金融风险的同时更累积了宏观金融风险,这一点应予强调。所谓金融期权期货交易是“零和”交易的说法,只是在两个不同的微观交易主体之间是“零和”的,无数个这样的微观“零和”交易在累积着全局性宏观金融风险,这是不能忽视或被机会主义地人为淡化与掩盖的,否则将是十分危险的。

——金融结构的巨大变迁。金融结构可以是狭义与广义的。因此,狭义的金融结构变迁可以仅指如戈德史密斯所指的金融机

^① 白钦先:《金融全球化——一把双刃剑》,载《求是》,2001年1月。

构和金融资产的数量变化,也可以是我本人特指的短期金融与间接金融同长期金融与直接金融比例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均衡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逆转,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①”。广义的金融结构变迁就要复杂得多了。它可以包括全球不同类型国家或一国不同时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衍生商品、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的数量变化(比例)与质量高低,以及上述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变化与比例等。

在复杂的金融结构变迁中,最核心的一种结构变迁就是前面我本人特指的所谓“金融倾斜及其逆转”,这一结构可以牵动其他结构并反映其他结构的变迁。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中,短期金融与间接金融同长期金融与直接金融发展的不平行、不均衡的所谓“金融倾斜”(向前者倾斜、或者前者占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及其逆转(即后者的发展快于前者且后者的市场占有率逆转为接近或超过前者)是最为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这大体上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的结构变迁。

——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传统上,在以银行为金融主体的条件下,金融的功能被简单地限定为单纯的中介功能;而在以金融市场为金融主体的条件下,金融的功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扩展与提升,如资产重组、风险分散、资源配置和以高乘数效应为核心的对经济的极强杠杆效应等^②。

——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与认知。金融的战略性社会资源这一本质特征,并不是我们人为地赋予它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强加给它的,它只是最近才被人类发现、揭示与认知的^③。

① 白钦先:《比较银行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载《金融时报》,1998年6月7日。

这是强调金融资源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它原来的这种资源属性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只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到知识经济金融经济阶段后才可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揭示与认知。这就将金融从单纯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到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

——金融自由化与一定程度的工程化。金融自由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潮流,最主要的是金融监管的缓和化,是不必要的、过时的、过于严厉的强制性行政干预的取消或缓和,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广与程度更深,这突出表现在利率的市场化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的涌现。

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工程化是金融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集中表现在金融商品、交易技术、定价与风险分散等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数学模型化和工程技术化。这一趋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重要的,以至于有的人称“金融工程学为21世纪的金数学”。如果说金融的某种工程化是金融领域的一种深刻变化和历史性进步,这在21世纪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样讲,并不为过。但金融能否完全工程化、数学化、技术化——即自然科学化,则值得商榷。实践表明我们应当善用数学,但不能滥用数学;应善用工程技术,但不能滥用工程技术^①。金融的工程化与金融自由化一样,都是一把正负效应同时存在的“双刃剑”。例如:微观风险在分散或者转移的同时也累积着宏观金融风险,这一点是应当强调的。此外,将金融的某种程度的工程化理想化高度完美化,自然科学化,同时又不断淡化它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科学本质,其后果将是令人忧虑的和危险的。

——资本市场成为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的全球性市场。随着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传统的以国别或地域界限构筑的藩篱被拆除或打破,使传统上相对封闭的局部性资本市场,发展为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这是过去一百年来金融诸多变化中最为核心性的深刻变

^① 白钦先等:《价值投资——一种平衡分析方法》,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革,它的后果巨大,影响深远。

限于篇幅,此处不可能展开论述,只从一个特定角度择其要素而言之: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传统上由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对于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形成严重的“财富漏出效应”,此其一;考虑、观察、衡量、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与金融效率时,必须既从国别更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此其二;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势与政策局限,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独善其身”已不可能,必须联动、互动、协调与合作;“肉烂了在锅(国)里”的老话变成了“肉烂了在锅(国)外”;武侠小说中的“大搬运”与“小搬运”,通过金融资源与金融商品的高速流转而风驰电掣般地进行。

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运动。除了变不变以外,都在变。因此,思想、观念、理论、政策与行动,都必须与时俱进!

——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和日益明显的虚拟化与独立化倾向。没有一定程度的虚拟,可以说就没有现代经济,也没有现代金融;现代金融假如还像传统金融那样同实质经济保持相当高的关联度,甚而几乎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就功能而论仍是简单的中介功能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现代金融及其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日益加深,以及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财富的存在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财富的物质形态日趋淡化,财富或资产的虚拟化倾向日趋明显。

现代金融,一方面以其日益丰富和深化的功能和精巧的杠杆系统推动或促进实质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并在形式上(当然也不是不包含内容的形式,但已形式重于内容了)继续维系着与实质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内容上,即在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和财富的聚集与集中速度等方面表现出与实质经济日趋明显的分离或背离的倾向。从而,现代金融与实质经济的关联度一天天弱化,或者说现代金融有一定程度的但是日益加速的独立化

倾向。现代金融比传统金融结构更复杂、辐射面更广、效率更高、运转或流动速度更快、联动互动性更强、风险也更大。

现代金融的相当程度的虚拟化或独立化倾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肤浅,甚至于重视也不够。现代金融的这一发展趋势或倾向,对于人类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在推动、便利与加速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与分化、重组和升级,从而将现代经济金融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根本上腐蚀、弱化、空壳化现代经济,甚至于是摧毁现代经济?这个问题一时还难以说得清楚,但必须逐渐说清楚。现在可以说清楚的是:既是福,也是祸;既有福,也有祸;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一个“度”,这个度,需要给予定性与定量的描述。

——金融危机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前如所述,现代金融比传统金融功能更深、效率更高、运转速度更快,风险也因此更大;此外,在经济日益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与经济的相关度日益提高,以及全球性金融市场高速运行的条件下,它的负影响也以乘数效应被放大,金融风险或危机的联动、互动、传导、传染也更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加之金融风险或危机本身所具有的“逐渐累积的特殊隐蔽性和突然爆发的极大破坏性”特点^①,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金融危机的运行态势,呈现出若干全新的特点,即:(1)从由“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到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转变;(2)危机的频率更高、危害性更大;(3)危机的发源国和传导路线方向逆转;(4)危机传导机制复杂化;(5)围绕危机的救援展开的博弈复杂化;(6)少数国家的危机长期化、深层化和复杂化,长期走不出困境^②。

——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传统上,金融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行业性、中介性单一服务系统,现代金融本身已成为包括银行金融、非银行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证券与保险、期货与期权、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长期金融与短期金融、全球金融

① 白钦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挑战与对策》,载《世界经济》,1998年6月。

② 白钦先:《面向21世纪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处理金融问题》,载《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12期。

与国别金融、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安全与金融主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文化与教育、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财政与税务、政治与军事、内政与外交、国家主权与安全、科学与技术、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

(二)

秀山君的《金融资源效率研究》是由我本人倡导的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研究的一部分,而这又同笔者过去二十多年来对金融基础理论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密切相关。这就有必要追溯以往。

笔者从事金融理论与教学工作凡 25 年,对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有一个由浅及深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传统理论观点有一个由坚信不疑到有所疑、有所探索与批判的过程,以及在继承基础上的局部的深化与创新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不断否定自我,又肯定自我的过程。然而,否定是困难的,肯定就更加不易。否定与肯定都是艰难的、沉重的和严肃的,否定与肯定都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我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某种怀疑和对金融的种种新的发展态势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上,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件是基金组织官员在会上尖锐地向在座的中国同行提出“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是年轻的中国研究生大胆地走到台前大声承认“有!”,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另一件是基金组织的一位官员在发言中披露,在 80 年代中期美国有 1/4 的人直接持有股票和债券,有 3/4 的人直接与间接持有股票与债券。这两件事在同一次会议中发生,前者涉及冲破理论禁区这一敏感问题,是一次思想解放;后者涉及金融新发展中的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是一种视野的开阔,使人以冷静的眼光观察广阔的外部世界的最新发展态势。这次会议引起我长时间的思索。

在1987年我的第一本专著《比较银行学》的最后一章中,我以一节的篇幅,郑重提出“金融理论的改革和金融改革的理论”这一严肃命题。这是我在理论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传统金融理论要变革要发展要创新”这一在当时颇为敏感的问题。记得当时我还是有些思想压力的,是在考虑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大胆”提出的。在文章中我还强调指出,“金融具有天然的渗透性,这一特征并非始于今日。80年代金融渗透功能的特征在于其渗透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这是我在90年代初明确提出宏观金融学与微观金融学和深入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发端。我还指出,“金融作为一种独立的领域和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再仅仅简单地是交换的中介,或大体与真实的生产与交易活动相联系,而是形成一种‘超越或脱离’这一切的独立力量^①。”

接着,我在1989年与孔祥毅教授合著的《金融通论》一书序言中,又专门详尽地集中讨论了金融经济和金融经济学问题^②。

笔者开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始于1993年的“第十届泛太平洋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发展大会”。那次会议上,我的《以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构筑中国的银行体制》一文获选大会报告论文。会议中我接触到“人类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两个文献,我十分惊奇地发现,这样两个总体勾画21世纪人类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重大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文献,竟然只字未提金融问题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在逻辑上、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从此我开始了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涉及可持续发展、经济资源观及金融资源论等三大领域。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它的现实针对性,最初是在60年代末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提出来的,它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来的。这一哲理性理念是崇高的和意义重大的,有时

① 白钦先:《比较银行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白钦先、孔祥毅:《金融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要更难”，因而它的贡献是可以载入人类史册的。然而，这一理念的现实针对性却从它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惊人的浪费和伴随这一进程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这一事实。这一片面性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得到纠正，使这一理念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且在实践上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历史任务，且制定了行动纲领，即“人类21世纪议程”。

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涵义和它的现实针对性都在不断丰富和扩展。它最初的涵义是今天的发展和福利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和发展为代价，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生态环境这一狭小领域；它现在的涵义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有效的和谐的持续性发展。请注意：(1)这一理念是以人或人类社会为中心，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为中心，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内有些人强烈主张以自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和本末倒置的。(2)可持续发展思想本身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理念，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关爱，而不是高度实践性的行动纲领，不要将这一崇高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否则反而会降低或淹没它的崇高和巨大精神价值。(3)这一思想有它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对全人类生存发展有重大的实践性意义。应当而且已经开始制定了全球共同的和国别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议程或纲领。(4)防止将这一理念在实践中高度局限化，或者如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强烈“反对将这一思想泛化”，主张只针对自然与生态环境这一最初领域。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一理念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这一思想产生后自身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而不会也不应该人为地局限在、凝固在某一层面或某一点上。试想，将这一崇高思想人为地“垄断化”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吗？(5)不应将可持续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协调发展。不错，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今天的发展不能以明天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福利不能以牺牲下一代的福利为代价，这种昨天、今天与明天的时间的连续性，以及这一代、下一代人“人本代际”发展的连续性，引申出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必然有诸多相关要素间的协调

及协调发展问题,这是不错的。因此,“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二者密切相关,但并不简单等同。将二者等同是有害无益的,只要回顾上述几点,其本质性差异并不难理解。(6)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有诸多相关要素的协调稳定发展问题,而可持续、可协调意味着一切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无效、低效或负效率肯定意味着发展的间断、要素间的不协调即发展的不可持续。这种发展的时间连续性与可持续性,还必须发展的空间连续性、均衡性、协调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否则时间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就没有实际意义。发展的空间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协调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或国别或地区、产业、行业、部门间发展的协调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例如虚拟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以实质经济的不协调无效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有效协调发展以另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不协调无效发展为代价,一些产业或行业的有效协调发展以另一些产业或行业的不协调无效发展为代价,这一切尽管是大量存在的,但应肯定是不正常的、有害的和长久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结论是:从可持续发展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连续性与协调性来看,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连续性与协调性来看,从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二重性,即金融既是经济的一部分又独立于经济来看,研究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没有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同时意味着实现了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简而言之,金融也有可持续发展问题,试图人为地排斥金融可持续发展,或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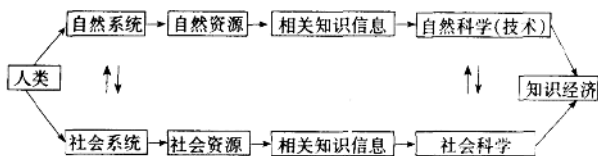
资源或经济资源观的更新。

在关于金融本质的研究与认知中,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经济资源观关于土地、人口和实物资本存量的限定,当人类处在农业经济时代或工业化早期,这一限定的不合理性并未暴露,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人类资财的构成中来自自然资源的比例相对日益降低,而在传统上人们不认为

是资源或经济资源的那些因素日益显示出其特有的经济资源的属性,并在人类资财的创造与构成中占有日益增长的比例,以至于人们如果继续无视非自然资源的存在与它的日益明显的资源属性,和它在人类财富增长中极端的重要性,那么许多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与财富的高增长这一事实就是一个悖论,30个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并非来自传统第一二产业,而是来自传统上人们不认为其创造财富的广义的第三产业、第四产业……这一事实就又是一个悖论。谁错了?不是客观事实错了,是人类传统经济资源观错了、不完全了、不够用了,需要有所突破、发展与完善了。于是人力资源、金融资源、文化资源、知识(产业科技与教育)资源这些非自然资源或者社会资源的存在就被认知了。

确立了非自然资源即社会资源的存在,也就为金融资源的存在与类属奠定了基础。而社会资源的极端战略重要性,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日益强化,以及经济日益金融化全球化的形势下,将会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显示出来。

至此,我们可以将与人类紧密相关的两大系统即自然系统、自然资源、关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知识与信息以及自然科学同社会系统、社会资源、关于社会资源开发利用的知识与信息以及社会科学两大系列在知识经济这一大系统下高度统一起来。



金融是什么,或者说金融的本质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两个古老而又年轻、说来简单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显然无法详尽讨论这一问题,但又无法回避或淡化这一问题。我高兴地看到,近两年来我国金融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关

注、研究与讨论正在升温与深入^①。笔者能力极其有限,显然无法准确完整地回答或解决这一难题,但如前所述,笔者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学习、研究这一问题。坦率地讲,在大大发展了的新形势下,迄今为止国内外的种种关于金融的“定义”,无论是“金融融通说”、“融通的工具、机构与市场的中介说”、“资本市场期权定价说”、还是“公司财务说”以及美国经济学家默顿的“不确定环境中资源的时间配置说^②”,它们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金融的某些本质特征、功能或专属领域,它们不外乎是美国的、中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经济金融学者的一些说法或认知,口径宽窄不一、视角不拘一格,又各自有明显的漏洞与片面性,因而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在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此问题的研究系列中,我列举三种简略作一评述。美国学者默顿的“不确定环境中资源的时间配置说”,揭示了金融的跨时间价值储藏和交易的本质性特征,不足之处是关于不确定性条件的泛用,不确定性是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特征,用一般性特征来解释限定特殊性概念,在逻辑上说不通。中国武汉大学江春教授运用产权交易理论阐述金融是一种货币化的产权,这种认知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又富有现代产权交易的时代特征。笔者在1998年初提出的“金融资源论”是感应知识经济和金融经济新形势发展而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揭示金融本质属性或特征的一种大胆尝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我提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社会财富的索取权”。前者强调金融的资源属性,后者强调金融的货币化资财的索取权、产权属性。在后者的意义上讲,“资源论”是包括“产权论”的,二者在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金融资源”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用和涵义,有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由不自觉地自觉、由侧面到正面,由辅助性非系统性概念到基础性系统概念,以及由归属经济学传统范式到归属金融经济

① 参见黄达的《由讨论金融与金融学引出的方法论思考》,载于《经济评论》,2001年3期;及曾康霖的《论金融理论的创新》,载于《金融理论与实践》。

② 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学新范式的发展过程。

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提及“金融资源”概念的西方学者是戈德史密斯,在《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戈氏谈到“本书应该探讨金融资源和传递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的影响……^①”可惜,他并没有重视这一概念的理论涵义,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顺便提及的辅助性概念,是偶然的和非系统的,因而也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以致在其后的几十年里,金融资源的概念并没有在西方金融学界引起重视,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中国金融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在讲话或文章中也使用过“金融资源”一词,但都不是正面的和系统的,且其涵义常仅指“信贷资源”或是一种泛指模糊概念^②。

中国学者正面地郑重其事地作为金融学理论的一个基础性系统性概念,始于笔者1998年5月25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开向中外学者提出的“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的讲演,文献则比这要更早一些^③。这立刻引起经济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反响,学术文章与座谈会、研讨会不断,被称为是1998年中国金融理论界的一件大事。

金融资源这一基础性概念和理论的提出,经过了十几年漫长的认识与理论准备过程,包括研究与撰写《比较银行学》八九年时间的艰难过程,对金融理论改革必要性与紧迫性的思考,对直接金融、长期金融与间接金融、短期金融结构的历史变迁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对金融是什么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对金融在相当程度上脱离真实经济而日益虚拟化的关注与研究,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经济金融功能与基本经济学金融学涵义的研究,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传统资源理论和新的资源理论的研究等等。在实践与理论上的最后推动力即现实背景是90年代拉美与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讲,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

① 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6页。

② 曾康霖、徐永键:《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载《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5期。

战略的提出,首先是具有反危机的倾向的,但远不止于仅仅作为一剂预防和治疗金融危机的药方,而是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现实做出的创造性回应,是面向 21 世纪的新金融观。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新金融观并不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否定,也未曾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在新形势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它的补充、丰富、发展与完善,使之能与时俱进,更加适应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新时代的特征与需要,并对 21 世纪中国建设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的伟大事业,从理论与政策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如笔者在所著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更深刻的根源是当代金融学的理论危机。而这种理论危机是根本性的和基础性的,即:(1)在范式层面的,对货币中性与否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金融学学科定位的脱离哲学人文关怀的工具性、技术性倾向,以及金融学方法论上的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分裂;(2)当代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支离破碎和研究范围的过于狭窄;(3)研究方法中的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

有鉴于此,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试图从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个层面展开:(1)在范式转换层面上,强调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入金融学研究,从而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这一理论从最高层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金融效率观;在方法论上,注重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2)在理论创新层面上,这一理论的创新在于提出了金融资源理论,以此作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创新根基,突出了金融资源论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以及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逻辑关系,进而指出这一理论现实的政策涵义。(3)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了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变革^①。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以金融资源理论为基础的,而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成本收益、后果与影响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金融

^① 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年版。